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法〕陈艳霞 著

华乐
西传
法兰西

商 务 印 书 馆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YSIA TCHEN
PUBLICATION ORIENTALISTE DE FRANCE 1974
(根据法国东方学出版社 1974 年版本译出)

HUÁ YUÈ XÌ CHUÁN FǎLÁN XÌ

华 乐 西 传 法 兰 西

(法) 陈艳霞 著

耿 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848-X/G · 248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2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8 1/2

定价: 12.10 元

译 序

中国不但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礼仪之邦。中国的音乐不但在华夏大地上诞生、发展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世界各地,对世界音乐的发展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现在,许多人在论述音乐问题时,往往过多强调外国音乐,尤其是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和对中国音乐的影响,而对于中国音乐的外传和影响,尤其是传入欧洲以及在那里产生的影响问题则很少谈及。殊不知,中西文化交流和影响永远是双向的,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虽然在某一段时间内,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可能强大一些,但从历史角度纵观全局,这种影响绝不是单方面的,绝不会出现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局面。

中国音乐问题当然也是如此。它吸收了外国音乐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外国音乐也从中国音乐中汲取了有益养分。中国音乐在国外的影响不仅限于日本、东南亚和中亚,甚至在18世纪的西欧第一王国——法兰西王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书恰恰就是具体论述中国音乐传入法国的过程及在那里所产生的影响。

在华乐传入法兰西的过程中,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 Amiot)神父起过重要作用。钱德明,字若

瑟,1718年2月8日生于法国土伦,1737年9月27日在阿维尼翁进入耶稣会修道院,1749年12月29日从洛里昂乘船出发赴华。1750年7月27日到达广州,1751年8月22日晋京。他本人为天文学家和作家,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11月18日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93年10月9日死于北京。他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

钱德明神父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如《满蒙文法满法字典》、《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中国历代帝王纪年》、《纪年略史》、《孔子传》、《四贤略传》、《列代名贤传》、《孙吴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中国学说列代典籍》等。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神父向法国传播中国音乐的主要著作共有两部,其一为1754年对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的法文译稿,其二是他1770年于北京写成的《中国古今音乐篇》。他还著有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书简。他把中国的一些乐曲和乐器寄往法国。法国围绕着他的著作而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

本书的作者陈艳霞女士是华裔法人,祖籍广东。她曾长期在距巴黎不远的蒙特热伦(Montegeron)公立中学教汉文课,后一度又任现法兰西学院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教授的助手。她晚年在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开中国音乐戏剧课。她的《华乐西传法兰西》一书于1974年在巴黎出版,由国立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作为《法国东方学丛书》之一刊布。

在此书之前,法国研究18世纪在法国掀起的“中国热”现

象时,重点是研究中国装饰图案、绘画、织物、色彩、丝绸、挂毯、园艺、建筑、瓷器、珍珠、茶叶、种痘术、人参等领域对法国的影响。而本书的问世无疑是填补了有关研究中国文明西传的一项重要空白。

本书在翻译时,为了印刷和使中国读者阅读乐谱更加方便,我们把原书中的 ut、re、mi、fa、sol、la、si 等音符一律用简谱 1、2、3、4、5、6、7 来代替。其中作者所引汉籍中凡能查到的尽量检出。对于一些有固定译法或约定俗成译法的名词术语,我们也尽量采纳。入华耶稣会士中凡有汉名者,均已查出。

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许多同仁和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先生们认真地审读译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于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当我们准备翻译此书时,苦于在北京各大图书馆都找不到此书,只好向法国的中国学专家朋友们求援,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谢和耐教授以及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夫人盛情地寄来了本书的法文版,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1992 年岁末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最早的论述(18 世纪中叶之前)	5
所谓的“中国戏剧”.....	6
勒尼雅尔和迪弗赖斯尼(1692 和 1699)	6
勒萨热(1713、1723 和 1728)	7
出自汉文载籍的著作.....	8
M. P. (1713)	8
马若瑟神父(1713).....	25
杜赫德神父(1735).....	34
普雷沃修道院长(1748)	42
严嘉乐神父	43
第二章 钱德明神父对李光地《古乐经传》	
一书的译本(1754)).....	44
钱德明神父在中国	45
《古乐经传》的译本(1754)	47
18 世纪对钱德明译著的评注	55
拉莫(1760)	58
阿尔诺修道院长(1761)	65
卢梭(1768)	73
鲁西埃修道院长(1770)	75
1. 《论古人的音乐》(1770)	76

2. 《致〈美术和科学学报〉作者的书简》(1770 年 11—12 月)	79
德拉博尔德(1780)	83
格鲁贤修道院长(1785、1820)	88
甘格纳(1791 年左右)	90
钱德明神父对某些评述的批评意见(1774—1776)	91
第三章 钱德明神父的《中国古今音乐篇》	
(1776—1779)	95
《中国古今音乐篇》手稿的寄发	95
《中国古今音乐篇》的评注和出版	98
《中国古今音乐篇》的内容	101
撰写这部著作的宗旨	101
中国音乐史概要	105
乐器	110
1. 八音和 8 种乐器	110
2. 律准	122
3. 古人调整五弦琴和七弦琴的方式	124
中国人的音乐大系	126
1. 律吕的发明和十二律	127
2. 律吕的度量	130
3. 律的相生	133
4. 音阶	146
5. 7 种调式和 84 种移调	151
6. 和声	156
《中国古今音乐篇》中引证的音乐文献:《先祖颂》	160
1. 《中国古今音乐篇》中的原文	162
2. 钱德明神父对歌词的译文	164

音符改编中所犯的某些错误·····	166
钱德明神父有关《中国古今音乐篇》的书简·····	168
第四章 钱德明神父搜集的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著作和文献·····	
《盛京赋》(1770)·····	172
《〈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1779)·····	175
平定金川时所唱的一首鞞鞞——	
满语赞歌(1779—1792)·····	176
两部舞蹈论著和《股肱》歌(1788—1789)·····	178
1. 钱德明神父对《股肱》歌词的录文和译文 ·····	184
2. 我们的译文 ·····	184
3. 《论小舞》一书中录下的《股肱》歌原文 ·····	185
钱德明神父汇编的《中国乐曲集》(1779)·····	186
钱德明神父寄往法国的中国乐器·····	200
第五章 18 世纪下半叶的其他著作 ·····	
出自汉文史料的著作·····	209
韩国英神父:《论中国的磬》(1780) ·····	209
德经(1784—1801) ·····	215
马戛尔尼伯爵和巴罗的英文著作(1792、1793 和	
1794)的 1798 年、1799 年和 1805 年的法译本 ·····	216
法文著作中对音乐的记载·····	225
德拉波特修道院长节录的杜赫德神父文 ·····	225
钱德明神父的《中国古今音乐篇》之节引文 ·····	225
1. 德拉博尔德(1780) ·····	225
2. 甘格纳(1791) ·····	228
3. 德经(1780 年之后) ·····	229

4. 格鲁贤修道院长(1785 和 1820)	232
结论.....	234
附录一 布阿斯教授对钱德明神父《中国古今音乐篇》 的评述(1926).....	239
附录二 以萨瓦尔计算的律之音程.....	242
参考书目	248

导 论

对于研究法国了解中国的历史来说,18 世纪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耶稣会士们于该世纪在北京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

在 18 世纪之前,法国究竟了解到了中国的一些什么东西呢?可以说所知无几。欧亚两大洲之间的民族曾一度建立起来的联系,后来在十字军时代又中断了。东方重新坠入了默默无闻之中。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那部令人不可思议的游记故事曾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的虚构神话。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直到 16 世纪才得以恢复。但只是到了 17 世纪末,法国才将其注意力转向中国文明,而不再仅限于注意由荷兰商人充斥欧洲市场的劣质商品了。

此外,法国人在 18 世纪之后对中国作何感想呢?当时旅行家们所描绘的那种滑稽荒诞的中国面貌胜过了由传教士们介绍的那种学识渊博并富于哲理的中国形象。法国人有关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处于没落时代的满清王朝使 50 个世纪的中国文明黯然失色了。那个由于其经济和领土屡遭外国列强侵犯而受到了伤害,并被那些具有好战本性的胜利者们嘲弄的中国,使人遗忘了从前那个科学和艺术兴旺发达的中国。旅行家们所绘制的中国的一种滑稽面具战胜了过去强加

给中国的丑陋形象，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能对中国进行考察和最终透彻地理解她为止。

因此，18 世纪可以作为了解中国的坚实基础。

法国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搜集 18 世纪时传播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以便向大众提供一种真实的历史记述和全貌。由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于 1697 年发起的追求中国古玩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白晋神父同一年回到法国之后，不仅为法国人研究中国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使皇家文库(现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前身——译者)拥有了它收藏的第一批从中国运来的相当可观的书籍，共 49 部，系由康熙皇帝令人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这就是中法之间最早的文化交流。我们发现，法国在 18 世纪出现了许多瓷器收藏家、品茗家和中国式建筑的崇拜者。楼亭、园林和佛塔等都美化了法国的一些山丘，而各种古玩则装饰了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

这个时代的法国装饰艺术普遍浸透着远东的审美观：素描画家、油画家以及织造品、彩纸、丝绸织物、挂毯的制造者都是通过主要由传教士们提供的画册、素描和艺术品而受到中国史料的启发后才创造出来的。考狄(Cordier)曾写道：“中国甚至在壁炉上也能得到一块保护地。那里铁板上的中国瓷人，即将取代路易十四的太阳或法国的百合花图案。”

如果说中国的形象侵入了法国人住宅的里里外外，那么大家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街头上所看到的中国影响，可以说也并不算少。法国国王、使节和宫廷中所有达官贵人都竞相使他们宫中的绘画变得更美，那都是一些真正的艺术绘画，都是诸

如杜图尔(Dutour)、于埃(Huet)和克雷潘(Crépin)这样一代著名宗师们的代表作,其中的动物画,花卉草木画和风景画……等,都蕴含着向往遥远东方的梦幻。另外,国务大臣贝尔坦(Bertin)的珍异品陈列馆也不断地得到由传教士们寄送的物品而日臻丰富。该珍异品陈列馆向当时的所有学者开放,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中国博物馆。在蓬巴杜(Pompadour)夫人玲珑美观的水族馆中,那些长着鲜红色鳞甲、其侧部呈金色的中国金鱼摆动着它们那轻盈的衣裙。

此外,传教士们笔下的那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也经常出现在当时法国最著名作家们的著作中。为了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赴北京的耶稣会士学者们在工作中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同时,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典籍也成了最有效的研究手段。他们的论著手稿很快在法国领土上与日俱增,并形成了一些重要丛书,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诸如《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国杂纂》这三部力作。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表现出了特殊的好感。他赞赏孔夫子的儒教学说,捍卫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文明,写成了其传世名著——法国的第一部悲剧作品《中国孤儿》,其内容是自远东(指中国——译者)借鉴而来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J. -J. Rousseau)、狄德罗(Diderot)等法国一代哲学圣贤同样也在研究和思考中国问题,中国成了18世纪法国哲学形成中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因素。

在中国文明于18世纪传入法国的历史中,有一种至今仍被忽略、并未引起普遍注意的内容,这就是中国的音乐。对此,当时的一些法国人也曾提到并做了论述。音乐是中国最古老

的发明之一，它不仅仅在美学中，而且在该民族的礼仪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虽然这是一个颇难触及的问题，但传教士钱德明 (Joseph Amiot) 神父则勇于蔑视所有困难，从而向其祖国提供了一种有关中国音乐实质内容的论著。这部论著一直是所有研究远东 (指中国——译者) 音乐史的开山之作。许多位法国作家都与钱德明神父一起直接或间接地论述过这种内容。各种中国乐器也都传到了法国，同时还有大量音乐文献，但至今仍未刊布，只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写本部中。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撰写本书以补充有关中国在 18 世纪对法国之影响的知识。

第一章 最早的论述

(18 世纪中叶之前)

从 13 世纪开始,在那位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时代,蒙古人的军乐就已经传到了欧洲斡罗思(俄罗斯)的腹地。1261 年,当马特奥·波罗和尼柯罗·波罗身处不里阿耳(Bolghar)的时候,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留在威尼斯其母身旁。当时在东鞑靼的封王旭烈兀(Houlagou)和西鞑靼的封王别儿哥(Barka)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稍后不久,当马可·波罗在狱中向比萨人鲁恩梯谦(Rusticien)口授其《世界珍异记》(即《马可·波罗游记》——译者)时,叙述了他从其叔父那里听到的有关这次打耳班(Derben)战役的故事。他于其中提到了在战场上擂击的大鼓(nakar)和骑兵们以其马鞭撞击的那些挂在马鞍上的小鼓。别儿哥的部队似乎获得了胜利,于是便班师回到了斡罗思的森林中,并把一首有关打耳班的歌曲传到了那里,直到 19 世纪时,俄罗斯农民仍在演唱它。^①

然而,欧洲提到远东音乐则是很晚的事了。据我们所知,法国在 1681 年于尊敬的神父梅纳斯特里埃(Menestrier)的

^① 请参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Chklovski):《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斯洛尼姆(Marc Slonim)自俄文译成法文,巴黎,帕约书店 1939 年版,第 73、76 和 77 页。

书中才首次触及这一内容，其书叫作《古今音乐的演奏》。在此书第 59—60 页中的《中国人的音乐》的标题下，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文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通行于欧洲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法律及其政府的政治准则称为‘乐’，唯有统治世家才掌握这种音乐的奥妙及其演唱方式。他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荆国(King，实际上是指楚国，史称“荆蛮”。因楚国于西周时代立国于今湖北荆山一带——译者)时代，灵王(Ling)的儿子幽王(U)成为中国南方的国君。幽公希望能适应伯牙(Pais)的生活方式，于是便开始学习法律和政府组织方式，以便依此行事。于是他向山东(Xan tung，原文如此!)的鲁王(Lu，原文如此!)遣使，以便使这些使者在娱乐中学到曲阜(Cheve，原文如此)家族的音乐。当时唯有该家族才掌握有关音乐的秘诀，他们向君主们传授音乐，以便使他们在娱乐消遣之中，学习他们为统治其民众而应懂得的学问。尧(Yumhius)是这种音乐的发明者。近代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史学家认为，“根据中国的典籍来看，这种音乐过去非常优雅；而现代音乐在他们之中则并不受尊崇，他们只能容忍在剧院中演奏这种音乐”。

所谓的“中国戏剧”

勒尼雅尔和迪弗赖斯尼(1692 和 1699)

然而，甚至就在白晋神父于 1697 年在欧洲掀起对“中国

工艺古玩”的迷恋高潮之前^①，勒尼雅尔(Regnard)就已经想到利用“中国”的名称把观众引向意大利舞台。1692年，他在那里设法排演了他自编的一台叫作《中国人》的戏剧。这是一出四幕喜剧，是由他本人与迪弗赖斯尼(Dufresny)合作写成的。这出喜剧中的名词“中国人”仅仅是一种统称，指一些异想天开的神奇人物，作者希望以此来取悦其观众们。这台喜剧中演唱的曲调，没有任何典型的中国喜剧之技巧，与在意大利舞台上演奏的其他乐曲别无两样。

在“坎普拉的威尼斯狂欢节”(勒尼雅尔语，1699年)的最后一幕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首叫作《中国乐曲》的舞曲。但其中演奏的同样也绝非是中国音乐。

勒萨热(1713、1723 和 1729)

稍后不久，阿兰·勒内·勒萨热(Alain René Le Sage)为其集市剧团写了几出这类戏的剧本，如《中国皇帝的隐形小丑》(1713年)、《中国的公主》(1729年)等。另外还有一出未能出版其剧本的戏叫作《卷毛犬小丑、宝塔和医生》，于1723年由雷斯蒂埃(Restier)先生的剧团在圣一日耳曼(Saint-Germain)的集市上演出。我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中找到了这部剧本的手稿(手稿第9314和25471号)。这些戏剧与真正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必要于此过多地泼洒笔墨。

^① 白晋神父是由路易十四国王于1685年派往中国的六名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于1687年入华，1697年返法并于同一年发表了其著作《中国现势志》，这本书成了一场迷恋中国热潮的起源。

出自汉文载籍的著作

M. P. (1713)

1710年，在维赛(Visé)逝世之后，夏尔·里维尔·迪弗赖斯尼(Charles Rivière Dufresny)获得了在《优雅信使报》上发表文章的特权。他于1713年10月于其中发表了一篇相当奇特的文章，篇名叫作《中国之谜》，或者是《某些中国歌曲的唱词》。文中对于汉文著作完全是直译和意译，我们由此可以得知中国语言的特征。由M. P. 寄到法国。

迪弗赖斯尼的这位匿名通讯人M. P. 似乎对汉语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可能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我们发现他常常把汉文词意理解得面目全非，甚至把整句话的意思都理解得谬之千里。他的汉语发音的对音不太规则，有时甚至很不确切。但他有勇气和毅力译写了两段歌剧唱词，一首牧歌和一段汉文天主教主祈经。他仔细地翻译了唱词，注出了音标并在最后一段唱词中附有某些乐符。

迪弗赖斯尼的这位神秘的通讯人究竟是何许人也？毫无疑问，他是第一批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否则，一名普通的旅行家是不会付出如此之多的辛苦的。如果我们假设认为大写开头字母P是这名传教士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那么它仅适用于指当时在华的三名耶稣会传教士，即巴多明(Parrenin, 1698年入华，1741年卒于北京)神父，徐日昇(Thomas